



《深刻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经验》是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月11日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收录在《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这篇重要文献深刻阐述了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创新和宝贵经验，肯定了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效，为坚持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提供了思想指引和理论指导。

全面从严治党有着丰富的实践基础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从严管党治党，有着丰富的实践基础和经验积累。

20世纪80年代，习近平同志到正定任职后，就把目光聚焦到了通过严格管党治党、加强党的领导来推进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一根本性问题上。他在1983年4月正定县第四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整顿党风严肃党纪是全党的责任，必须全党动手抓；各级党组织要认真按党中央的要求，党委重视、全党动员、领导带头、人人负责，向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从1983年正定的“六项规定”，到1989年宁德的“十二项规定”，再到2012年中央的“八项规定”，集中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建设、严格管党治党方面的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和一贯坚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出系列重大部署，带领全党开辟了党的建设新

境界。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就郑重提出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2014年10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这一重要概念。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将“全面从严治党”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列提出。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系统阐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成为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征。

全面从严治党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

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要求“全党必须警醒起

来”，发出了“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动员令，并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全面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清醒。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就指出，这么多年中央经常讲、反复提“两个务必”，围绕改进作风发了不少文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为什么背离“两个务必”，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那一套还有不小的市场？主观上说，主要原因是一些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好。客观上说，主要原因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在有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方面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管党治党，必须严字当头，把严的要求贯彻全过程，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

全面从严治党是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主动。正是基于我们党所处时代特点的科学定位

和对党的自身问题的清醒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战略思想，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取得了卓著成就和宝贵经验，开辟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

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弥足珍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发扬我们党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从六方面总结概括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创新和宝贵经验。

第一，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不同时代特点以及面临的突出问题而实施的战略策略。而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有机地统一起来，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史学研究——翦伯赞的治学之道

□ 王庆婷

翦伯赞（1898—1968年），湖南常德人，维吾尔族，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并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翦伯赞并非学习历史出身，他早年学习经济学，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探寻中国社会的前途，积极参加社会史论战，进入史学研究领域，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他一生著述宏富，在史学理论、通史撰著、历史教学等领域均有重要成果，其治史思想在今天仍值得我们不断学习。

理论指导

史学研究的每一步都需要理论的指导。翦伯赞强调，理论要放到史学研究最重要的位置。开展史学研究，在确定了研究的问题后，第一步是收集与辨别资料。判断什么资料是重要的，什么资料是次要的；什么资料是典型的，什么资料是非典型的；什么资料是真的，什么资料是假的，都需要理论的指导。第二步是把史料变成历史。不能说“史料即史学”，史料在成为历史的过程中需要正确的理论分析。第三步是得出结论、作出总结。翦伯赞认为，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就是替这个人物作总结；研究一个历史时代，就是替这个历史时代作总结；研究一个历史事件，就是替这个历史事件作总结。作总结则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只有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分析研究资料，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理论先行是翦伯赞从事史学研究的特点。他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事实相结合，完成了《历史哲学教程》，作为撰写通史的理论指导。在撰写《中国史纲》时，他又写出《略论中国史研究》，进一步深化总结中国历史的研究理论。20世纪60年代，他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

见》《目前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宣扬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并以此为指导主编《中国史纲要》和《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等教材和教辅。正是因为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这些著作得以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至今仍为学界推崇。

熟知史实

熟知中国史上的具体史实是开展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翦伯赞强调，要熟知史实，就要深入到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他认为，首先要研读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对于中国历史得到一个上下古今之连续概念；然后读以二十四史为主的纪传体史书，了解历史人物；还要读纪事本末体史书，详细了解历史事件。关于阅读方法，他指出读编年体史书应该“一页接着一页去读”，读纪传体史书和纪事本末体史书，则最好采取一种“检阅的方法”，即读完编年体史书之后，如果想对具体的某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得到原原本本的了解，就到纪传体史书中检阅相关传记，到纪事本末体史书中检阅相关事件。经过这样的阅读，便会有清晰的认知。

翦伯赞在少年时代就熟读《左传》《资治通鉴》《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为其研究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40年代初，他研究先秦史和秦汉史，发表多篇论文，并迅速著成深受广大读者推崇的《中国史纲》第一卷与第二卷。研究明史与南明史时，他又充分阅读《明鉴》《明纪》《明史》等基本史籍，熟悉明朝与南明的史实，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辽沈沦陷以后的明史》《论明代的阉宦及阉党政治》《桃花扇底看南朝》《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文章，

分析了明朝灭亡的原因，为南明史研究立下“开创之功”。

广搜史料

古代史籍虽然也是史料，但对于史学研究者来说只了解这些远远不够。翦伯赞认为，研究历史应该详尽地占有史料，“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의 总和中，显出它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它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它的发展法则”。

“只要我们耐烦去搜集，则无往而非史料。”翦伯赞将文献学上的史料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指经、史、子、集四部文献，另一类是包括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碑铭墓志、私人的函札、宗教经典、账簿、家谱、杂志、报纸、传单在内的四部文献以外的各种文字记录。关于搜集文献史料的方法，他认为首先要进行史料探源，用目录学的方法寻找史料线索，然后用逐书搜求的方法，从与所需要的史料有关的文献上去查找；其次也可以从一种书的引用语或注解中去追寻与这一史料有关的其他书类；另外还有很多史料会由于直接看不出它的价值而被忽略，对于这类史料则需要研究者提高认识史料的能力，能够通过统计学、分析法、比较法等各种手段把史料钩索出来，尽可能多地网罗史料，为研究服务。

翦伯赞不仅重视文献资料，也充分肯定考古史料的价值。他认为经、史、子、集以及四部文献以外的各种文字记录虽然可以相互补充、订正，但这些史料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要保证史料的真实性，还需要考证于考古资料。他的诸多论著，尤其是先秦史、秦汉史以及民族史的相关研究，在史料运用上都实现了考古学的史料与文献上的史料结合为一，使得论证更显充分。

勤于记录

善于整理笔记是翦伯赞论著高产的一大法宝。整理笔记是与搜集史料相关的工作，它并非简单抄录，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讲究一定的方法。翦伯赞提出，在搜集史料过程中，应该用做笔记的方法将史料按照不同的性质分类记录，而且分类愈细愈好，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整理。比如，研读一本史书的时候，依据史料的性质，第一次记录经济史料，第二次记录政治史料，第三次记录文化思想史料。这样可以使研究者的注意力集中于一点，整理出来的史料突出了不同的性质特点，自然形成一个系统。

翦伯赞的著作《历史哲学教程》就是在记录、整理笔记的基础上著成的。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同时，他先按照历史发展的五个阶段把书中有关各个阶段的表述抄在本子上，然后又把可以论证这种观点的史料分别抄在后面，经过细致整理、总结，最终写成了他在史学理论领域的代表作《历史哲学教程》。

翦伯赞的史学研究生涯前期和后期都以理论研究为主，同时他在史料学方面也成绩斐然。有人评价他：“固在傅斯年‘史学本是史料学’之上，更非并时之史的唯物论者所能企及。”翦伯赞治史一直坚持史论结合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他带着马克思主义理论钻进浩瀚的中国史料中，将理论与史料结合，勤于动笔，善于整理史料，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开创者之一。



又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更严的标准，进行更严的管理和监督，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一个显著特点和成功经验。

第四，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离开责任的权力，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牢牢抓住管党治党责任的“牛鼻子”，层层传导压力，把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贯到底，形成了全党动手一起抓的生动局面。

第五，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信任是最大的关怀，但信任不能代替监督。”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坚持维护党的纪律严肃性和信任爱护干部相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很好地运用了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最大限度地防止了干部出问题，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干部积极性。

第六，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必须探索出一条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的有效路径，这关乎党和国家事业成败，关乎我们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秉持这样的战略思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健全党内监督体系，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畅通人民群众监督渠道，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全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得到显著增强。

习近平同志对全面从严治党经验的总结概括，深刻阐释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内在逻辑，为全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基本遵循和重要保障，是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的行动指南。

用典释义

民富国强，众安道泰。

【讲话原文】古人说：“民富国强，众安道泰。”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提出新发展理念时，我就强调，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21年1月28日）

【出处】于是越王内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谋，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国中荡荡无有政令。越王内实府库，垦其田畴，民富国强，众安道泰。越王遂师八臣与其四友，时间政焉。

——（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

【解读】《吴越春秋》是东汉史学家赵晔所著的一部有关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历史的著作，今存十卷。前五卷为吴事，起于吴太伯，迄于夫差；后五卷为越事，自无余以至勾践，讲述吴越争霸的史实。

“民富国强，众安道泰”出自第八卷《勾践归国外传》，意思是人民富裕、国家强盛，则社会安定和平。《勾践归国外传》记述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放回回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通过一系列发展生产和提升军队战斗力的措施使越国民富国强，具备了伐吴复仇能力的故事。中国古代就有“藏富于民”之说，认为只有百姓生活富足，国家才能繁荣稳定、长治久安。故《吴越春秋》把“民富”放在“国强”之前。

2021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就做好“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开好局、起好步的重点工作进行第二十

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引用古语“民富国强，众安道泰”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

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的好日子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13亿多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大幅度提升，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其他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共同富裕道路作了新的探索，对共同富裕理论作了新的阐释，对共同富裕目标作了新的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现实任务。我们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做好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各方面工作，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杨立新）